

晚清湘人入黔与贵州政治及文化之发展

谭德兴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晚清时期湘人入黔频繁。入黔湘人在平息社会动乱、维护封建一统、强化社会治理、复兴文教、推动新政和方志编纂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入黔湘人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在晚清的贵州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改变了贵州旧的思想观念,推动了贵州文化快速发展,对晚清贵州优秀文化品格诸如开放与兼容并蓄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晚清湘人入黔,是省际人才流动的重要表现,对区域文化发展贡献巨大。

【关键词】:晚清;湘人;援黔;经世致用;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166—10

晚清时期贵州文化获得了空前发展,而这种发展无疑与省外文化的输入关系密切。省外文化输入主要通过外省人士入黔而完成。晚清众多入黔的省外人士中,湘籍人士数量占据绝对多数。近代湖湘文化发展居海内之冠冕,湖湘文化亦通过湘人入黔对贵州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探析晚清时期湖南人士在黔的活动,对研究湖湘文化的内涵与影响,以及近代省际人才流动对区域文化发展影响均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 入黔为宦的湘人及其社会治理

晚清时期,湘人入黔为官者很多。关于晚清贵州湖南籍官员的史料,主要见载于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由《专纪》和《通纪》两部分组成。凡入《通纪》者均属对贵州发展作出一定贡献者。而能入《专纪》者,则属对贵州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者。故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一》曰:“明清以降,必其人功绩优异,于地方有莫大关系者,始入《专纪》,余则概入《通纪》。”^①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五》属《专纪》,载录的是晚清时期贵州宦迹中的功绩优异者,共11人,其中山东、浙江、安徽、四川、广西籍官员各1人,江苏籍2人,而湖南籍官员则占了4人,分别是贺长龄、胡林翼、席宝田、黎培敬。很明显,晚清于贵州“有莫大关系者”中,湖南籍官员占据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湖南籍官员对晚清贵州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的《通纪》又分总部和分部。总部载录督抚、监司和武职。分部载录府、州、县的官员。《通纪》载录的官员籍贯有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其中《通纪》总部载录晚清贵州湖南籍官员90人,分部载录80人。分部的湖南籍官员在晚清贵州各地区分布情况为:贵阳府5人、安顺府7人、大定府2人、遵义府9人、兴义府7人、都匀府8人、黎平府10人、镇远府17人、思南府6人、铜仁府4人、平越直隶州5人。无论总部还是分部,与其他省籍官员相比较,湖南籍官员数量明显占优。而且,晚清贵州各府、州、县都有政绩突出的湖南籍官员,这充分说明晚清湖南籍官员对贵州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¹收稿日期:2018—10—25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项目(17GZX11)

作者简介:谭德兴(1968—),男,湖南麻阳人,博士,博士后,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97页。

(一)湘军援黔，维护封建一统

晚清时期，满清王朝风雨满楼，飘摇欲坠。特别是咸同时期，国内动荡空前激烈。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战争的高潮。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亦波及贵州。一方面，太平天国起义的成功推动了贵州苗民等反清斗争；另一方面，太平军石达开余部进入贵州直接引导参与和贵州苗民起义。也正是咸同时期贵州的苗民、白莲教等起义，才导致湘军援黔，从而使得一大批湘人进入贵州，这也是晚清时期湘籍人士与贵州频繁互动的高潮。

咸同时期，由于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被用于对付东南的割据政权太平天国，故不得不通过抽调贵州邻省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等军队来平定贵州苗民等起义。在平息咸同贵州社会动乱中，湘军无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五》载席宝田入黔：

（同治）六年（1867），以父老丁单，呈请开缺终养，允之。时东南底定，惟贵州苗匪虔刘，通省殆遍，湖南沅、晃、靖、会、黔、麻等处，皆通贵州，日常告警。湖南巡抚李瀚章奏起宝田接办黔事，宝田以终养辞。嗣刘昆抚湖南，知宝田有文武才略，起益力。是年冬，奉命招集旧部入黔，并统领援黔各军。师次沅州，定义先翦教匪，后勘苗疆。教匪者，石阡、思州、铜仁各属乱民，倚苗为粤援。^①

席宝田，湖南东安人。咸丰初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席宝田率乡团跟随官军与太平军在湖南、江西交战，因战功卓著而被授贵州按察使，但未赴任。促使席宝田真正入黔的是贵州严峻的社会形势。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贵州苗民、白莲教等纷纷起义以反抗清廷。《清史稿》云：

贵州苗、教诸匪构乱十有余年，东路素倚湖南援军，自粤匪平后，议大举剿平。先是授兆琛为贵州布政使，偕总兵周洪印率师往，积岁无功。李元度围荆竹园，亦久不下。巡抚李瀚章、刘崑先后劾罢兆琛、洪印，元度亦镌级，荐起宝田招集旧部万人入贵州，总统东路诸军。^②

席宝田入黔实乃临危受命。之前，贵州苗民起义已经历十余年，朝廷屡次征剿都无功而返，起义军的势力反而越来越壮大。清廷不得不启用席宝田等入黔平定苗、教起义。时湘军奉檄入黔的军队很多，如靖州周洪印、平江李元度、湘潭黄润昌、新宁邓子垣等各率精兵入黔“平苗”，清廷以席宝田为黔东各路军统领。席宝田运筹帷幄、善用谋略：

黔苗之乱，诸将率兵征讨，历年无效。宝田一战破之荆竹园，后遂行雕剿之法。雕剿者，悬军深入，饥因敌粮，夜宿敌垒，行不持营帐，居不依城寨，军不时出，出不时返。昔岳钟琪、张广泗尝以此法制苗，宝田尤殚其能。犯瘴疠、践冰雪，缒幽穿蛆，攀度箐壑，寻逐于猿鸟俱绝之境，出万死以猝攻不备，往往破灭；或分军夜取城砦，衔枚周趋平扣而前，趾与趾相错，军士咳则伏地，以指掘土，令声入地中，其艰如此，用兵五年而苗平。^③

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十一年（1872），前后五年，席宝田历经曲折，最后平定了黔东、黔东南等地农民起义，平息了贵州十余年的社会动乱，为维护满清封建大一统局面立下汗马功劳。

以上湘军均为善化人，也都在咸同贵州战场因军功获职。这种现象在晚清时期的贵州是比较普遍的。事实上，咸同时期的贵州战场亦成为湖南籍人士建功立业的一个平台。通过咸同时期在贵州的“平苗”，湖南人为巩固满清封建政权一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②（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46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2页。

(二)经世致用，强化社会治理

一个地方的稳定与其社会治理关系密切。晚清贵州湖南籍官员在强化地方社会治理方面政绩突出。如贺长龄，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间任贵州巡抚，前后共9年时间，这是贺长龄作为封疆大吏在政坛独当一面的黄金时期。贺长龄是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其《皇朝经世文编》影响巨大。贺长龄51岁入黔，60岁出黔，在黔中的九年是其思想最成熟时期，而在黔的为政举措正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实践。据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五》所载^③，贺长龄在黔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治理方面，有缉盗贼、惩胥吏、革陋规、禁鸦片、贍仓储、练营伍、收恤孤嫠、行养婴幼；其二，文化发展方面，有兴文教、建义学、培植士子，并亲自为生童讲授经义，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其三，经济发展方面，有开通沟渎、布种桑棉、劝耕织，推动民生巨大发展。不难看出，贺长龄的为政举措一切围绕民生和民风建设展开，十分注重社会治理的实效。贺长龄在黔9年是其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实践的9年。又如，胡林翼，其在黔为政颇具特色：

咸丰元年(1851)，补黎平府。府境毗连湖南、粤西，山深箐密，盗出没剽夺，捕之辄越境窜。公至日，延绅民即椎结左衽诸渠，率赐以酒食，详询民情地势，令相连为堡，设立乡正、团长、牌长，互相稽核，捕治诸不法者。是时广西贼大起，永宁、怀远、融县，环黎平西南寨皆贼。公募壮勇扼隘防堵，办团千五百余寨，建碉卡四百五十余座，连屯相望，上言督抚，请环边要隘，筑堡守御，以为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以自卫，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郡城故无储积，劝富民捐谷置仓，以备城守。自后黎平叠被攻扑，城卒不可拔，皆公练勇储粟力也。^②

(三)复兴文教，注重人才培养

一个地方能否发展，人才是关键。晚清时期贵州85年间(1820—1905)举人数量1781人、进士数量313人，占贵州建省(1413)500年以来举人进士总数的一半，且于光绪时期出了赵以炯、夏同龢两位文状元，一时政坛名臣与学术名人如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李端棻、张之洞、丁宝楨、陈夔龙、姚华、黄彭年等纷纷涌现。人才之泉涌还得归功于晚清贵州教育的高度发展。而这其中，湖南籍官员的贡献较大。

例如，湖南湘潭人黎培敬^④，自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四年(1878)的14年时间在贵州任职，先后出任贵州学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之职。光绪五年(1879)“因奏请开复已故革职云贵总督贺长龄处分，并请求予谥建祠”，受朝廷降三级处分，调往四川，光绪六年(1880)擢升漕运总督，七年(1881)授江苏巡抚，旋病回湘，八年(1882)卒于湘。黎培敬入黔时38岁，出黔时52岁，可以说，黎培敬的政治生涯几乎都在贵州度过，也将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贵州大地。黎培敬入黔时，正逢贵州苗民起义如火如荼。他认为贵州社会动乱根本原因在于文教缺失。其时，贵州官学、私学几乎均处在停滞状态，各级学官中的考试全部停止。面对这种严峻的教育形势，黎培敬亲自前往贵州各州县甚至前往苗族聚集区进行督学和考试。这种恢复振兴贵州教育的精神气壮山河，其过程也颇为惊心动魄。据《抚黔奏议》，黎培敬入黔相当曲折与不易。因黔东、黔东南与湖南交界地带苗民起义炽烈，故黎培敬是绕道四川，进入毕节、织金，再到贵阳。尽管这样，贵州西边的道路也不太平，“昼伏夜行”，“翻山越岭”^⑤，九死一生、历尽艰辛，方才到达目的地。而入黔后，黎培敬面对的是官学之凋敝与教育之废止。《抚黔奏议》云：

臣荷蒙恩命视学黔中，于本年三月十三日接印视事，查前任学臣陆仁恬任内仅考大定、安顺两府，荔波、独山两县。再前任黄图南任内，上游尚有兴义府、普安厅未考，下游平越直隶州、松桃厅、石阡、思南、镇远、思州、铜仁、黎平如兵燹日久，军务纷繁，考试一节，几若视为具文。臣思人心不靖，多由于士气不伸，当次凋敝已极，州县每以应酬考试为难。贵阳为省城根本，前届岁科均已停考。^⑥

^③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②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0页。

^③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4—245页。

^④④(清)黎培敬《黎文肃公遗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⑤⑤(清)黎培敬《黎文肃公遗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2—73页。

一个贵州省，在黎培敬来之前，正常的科考活动只有区区安顺、大定两府尚能够勉强维持。而等黎培敬到贵阳时，连安顺、大定的科考都无法进行。整个贵州省的教育几乎废止。尽管贵州文教现状惨不忍睹，但黎培敬不气馁，其恢复科考之决心十分坚定，但过程却颇为艰辛。《抚黔奏议》曰：

安顺为通省完善之区。九月初十日臣考试文场甫毕，突潘逆大股由广顺窜逼郡城，知府吕序程稟请暂停武试。臣思该处见有提臣赵德昌驻扎，遽令武场停止未免摇动人心，不得已严谕各学教官廩保等，协同巡查防守。臣一面阅看武场。贼连日攻扑提臣，兵单未能得手。十三日夜四更时，贼乘睡熟，蜂拥爬城，幸守堞人役得力，贼未得逞。适护抚臣派调候补知府毕大锡带队来援，贼遂退窜镇宁一路。^{①④}

黎培敬奔波于贵州各府州县督促恢复科考。“奔走数千里，遍试下游各郡，虽其间历道路之崎岖，经江河之险阻，值兵戈之扰攘”^②，真可谓历尽艰辛、九死一生。黎培敬常常一边组织考试，一边奋勇防御。有时带领武童直接从考场奔赴战场。更有考生为此献出生命。黎培敬硬是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恢复振兴贵州教育与科举考试，不但维系了贵州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命脉，而且为贵州人才培养打下重要基础，为晚清贵州文化之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培敬为激励贵州士子学习，树立人才培养的榜样，编纂了《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和《黔中校士录》，选编优秀士子的制艺作品（八股文、试帖诗）作为范型，供广大生童学习与参考。《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是黎培敬任贵州学政时选取贵阳贵山、正习、正本三书院生童优秀课艺作品编辑刊刻，给书院学习的生童一个制艺范型^③。黎培敬常常亲自到贵阳三书院为生童传授学问、主持考试，其改变贵州教育的愿望十分迫切。《黔中校士录》收录同治四年（1865）贵州乡试录取生员 150 多人的文章和诗歌作品。黎培敬所选的这些优秀制艺作品的作者，其后大多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充分显示出晚清贵州人才培养的质量。晚清贵州人才发展在同治、光绪时期最为繁荣，这无疑应归功于黎培敬。贵州教育，从同治初年几乎废止的现状，到恢复、发展、繁荣，这是黎培敬主政贵州 14 年的最大贡献。可以说，黎培敬对推动贵州近代教育发展立下卓越功勋。黎培敬最敬重的学者是贺长龄，而且最后还因为已故贺长龄恢复名誉而自己受到降职处分。足见其对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折服，其在贵州 14 年的所作所为，正是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诠释。

注重文教是入黔湘籍官员的共同特点，又如：

邹元吉，字迪仁，湖南靖州人，举人。光绪十四年（公元 1888 年）任兴义府。时郡城兵燹后，文风未振，元吉以兴复文教自任，于是聘积学士主讲文峰书院，设培文局，抽收毫捐助书院膏火，时召诸生至署，亲为讲论，士心翕然。旋以试院毁于兵燹，元吉锐意修复，庀材鸠工，几复旧观，撰联有曰：“遗爱难忘，尝说张公为政；后尘继步，敢云邹鲁多文。”^④

邹元吉任兴义府时，正逢清末贵州大乱之后。面对兵燹后“文风未振”的局面，邹元吉治理措施首先“兴复文教”，其建文峰书院、设培文局，并亲至书院为生童讲授。邹元吉立志继承原兴义府知府张瑛重文教的政教传统，欲将兴义打造成如山东邹鲁般文化之乡。这种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对推动清末兴义的文化教育发展作出很大贡献，清末民初贵州乃至全国政治风云人物兴义的刘显世、刘显潜、王文华、袁祖铭以及何应钦的出现可以说直接归功邹元吉在兴义打下的教育基础。这也是近代湖南经世致用思想在贵州结出的累累硕果。

（四）推行新政，开创教育新风

光绪后期，朝廷推行新政，这是继戊戌维新变法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的一场社会变革。光绪新政是满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后的被迫改革，虽然这场变革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刻的，也取得了一

^{①④}（清）黎培敬《黎文肃公遗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0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3 页。

^②（清）黎培敬《黔中校士录》，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第 2 页。

^③何建菊，谭梅：《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与晚清贵州的书院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7 年第 3 期。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49 页。

些实际效果，对推动中国新旧文化转型与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光绪新政在贵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在清末贵州湖南籍官员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

何树茨，号辉廷，湖南郴州优贡，光绪末年任清平。时新政风行，尝捐廉倡办师范传习所，又筹款设立巡警教练所，及本城高小学校暨实业讲习所。调查户口，整理烟禁，缉匪清乡，便衣出巡，昼夜不怠，邑中振刷一新。惜在任未半年，丁艰去。士民皆失望，钱行且至数十里，共谓“邑中数十年能任事而得民心如是者，盖亦仅矣。”（《清平册报》）丙午（1906）科优贡，邃于经史学，宣统元年（1909）署任，设立速成师范传习所，提倡教育，不遗余力，划拨公谷七百四十八石，设立本城高初两等小学校；提乡场屠斗捐，创办四乡初等小学校，八寨教育基础于此。^⑤

何树茨任八寨厅同知，其在任上极力推行新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除了“调查户口，整理烟禁，缉匪清乡”等社会治理外，何树茨最大的政绩就是创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开八寨文化教育新风。其倡办师范传习所，设立巡警教练所，设立高初两等小学和四线初等小学校，办实业讲习所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教育中所没有的新的教育模式与内容，彻底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教育观念。说“八寨教育基础于此”，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故民国《八寨县志稿》说：

到任后即微服到乡间私访人民疾苦，地方利弊无不洞若观火。然后定义兴革，以故诸事悉中肯綮，人民爱而畏之。时创设新政，罢科举，学堂为当务之急。树茨以邑处边隅，风气初开，师资缺乏，即设立速成师范讲习所，择地方绅士之堪为教授者入所讲习。分正副二班，限期毕业，自兼讲员，待学成后乃分向各乡教授。设本城高初两等小学一所，划拨地方公谷柒佰肆拾捌石为修脯暨购书籍置器具之用。又委劝学员到乡间劝设国民小学十余所，人民受其感化，遐迩称扬。未一年，改调清平县，攀留祖道者数十里不绝。今学校逐渐推广，已达二十余所，每念其经营草创之功，辄称颂不置云。^⑥

在西南僻壤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范围内，却在文化教育方面干出了一番惊人成绩。这对于当时地处偏远、交通信息闭塞的贵州不啻一个教育界奇迹。何树茨从湖南来到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县，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思想、新做法，通过扎扎实实的行动与实践，在穷乡僻壤实现了新旧教育的转型，开创了新式教育的新风尚。类似的事例很多，如宁乡人岳衡光绪三十二年（1906）莅普安知县，大力推行新政^⑦。光绪间长沙人张翰在开州创办新式教育等等^⑧。这些湖南籍官员能充分意识到改变贵州文化落后的重要性，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推行新政，大力发展地方文教。这也是近代贵州湖南籍官员为政举措的最大共同点。这种文化输入在推动贵州文化发展方面的成效十分显著。

二 入黔湘人的方志编纂及其文化意蕴

晚清时期，贵州史学发达，尤其表现在方志编纂上。在晚清贵州的方志编纂中，入黔湘人参与者众多，或为方志编纂发起者，或为总纂，或为纂修，或为分辑。入黔湘人所编纂的贵州方志水平高、理念新，不但保存和弘扬了贵州地方文化，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志编纂的巨大发展，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保存与弘扬贵州地方文化

方志的编撰，是对一个区域地方文化的整理与研究。晚清时期，贵州方志编撰活动频繁，成果丰硕。其中道光《遵义府志》《大定府志》《贵阳府志》以及咸丰《兴义府志》《安顺府志》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晚清贵州方志编撰中，湖南籍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道光《贵阳府志》的编纂。周作楫序云：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秋日调署贵阳，中丞贺耦耕先生即以府志见委，谓：“黔中受国朝恩泽二百余年，前此仅有通志。近日山

^⑤①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⑥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9）》，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163 页。

^⑦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50 页。

^⑧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408 页。

川秀发，人文蔚起，贵阳为通省领袖，志乘缺如，此守土者之责也。尔其修之！”余曰：“是不易易，非楫之所能为；而先生谆谆之意，似不能已”。于是谋诸在籍之显官绅耆，如漕帅朱荫堂封翁、家石藩、杨兰圃、观察王梦湘、兵部刘心农、司马陈杰峰、刺史孔叙五诸公，皆解囊捐金，踊跃以期于必成。遂延思南萧玉初明府开局于府学明伦堂之右，各秀士任采访者若而人，任誊录者若而人，任杂事者若而人，网罗旧闻，捃摭遗逸，历寒暑而无间，勤铅槧而弗遑。阅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其时，学政胡小蘧先生、方伯李双圃先生、前廉访吴仲云先生皆以为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劳，犹美而未善也。与贺中丞商之，复聘湖南宿学邹叔绩先生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据经史以辟异说。自“宸章”以至“土司”，列为八十八卷，余编二十卷。条分缕析，体大思精。质之今宫傅见斋先生、前方伯苏溪先生，咸以为有典有则，不懈而及于古，可付剞劂矣^{①6}。

据此可知，道光《贵阳府志》的纂修是由贺长龄提议，周作楫受命而为之。最后的关键修删由湖南宿学邹汉勋完成。道光《贵阳府志》虽然是众人合力完成的方志杰作，但若没有贺长龄之提议，又怎有《贵阳府志》的编纂实施；若没有邹汉勋之“去复删繁”，又怎能使其“以归大雅”“体大思精”“有典有则”呢！可见湖南人在道光《贵阳府志》编纂中的关键作用。另，分纂人之一的邹汉章是邹汉勋的亲弟弟，亦可见新化邹氏兄弟于《贵阳府志》的编纂之功。

邹汉勋是晚清时期湖南著名学者，除删定道光《贵阳府志》外，其在贵州还主纂了道光《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兴义府志》（咸丰四年）、《安顺府志》（咸丰元年），这些方志纂成后均获得较高社会评价，如道光《大定府志》，贵州巡抚乔用迁评其“搜集之富，体例之精，为足尚已”^②。云贵总督林则徐评其“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③。贵州学政翁同书评其“是书体裁尽善，庶几常璫之流”^④。咸丰《安顺府志》也获得了著名学者吴式芬等高度称赞^⑤。邹汉勋的史学才华，在晚清贵州这个舞台得到充分展现，对中国方志编纂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湖湘文化经世思想在贵州学术文化领域开花结果，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的思想内涵。

又如，光绪《古州厅志》编纂，湖南人参与很多。“鉴定”者中有布政使衔贵东兵备道易佩绅（湖南龙阳人，今汉寿）。“主修”者中有布政使衔贵东兵备道吴自发（湖南镇宁人）、署理贵东兵备道储裕立（湖南靖州人）。“总纂”为古州同知余泽春（湖南武陵人），“纂修”有户部主事余嵩庆（武陵人）、易顺鼎（龙阳人），“分辑”中有湖南天门人候补知县徐永熙。此方志编纂与刊布过程较为曲折。光绪古州同知吴厚恩序曰：

光绪丙子丁丑间，武陵余我如太守泽春权篆兹邦，念志乘之未修也，乃慨然检尘牍，稽故籍，询之耆老，证厥见闻，将采辑而编纂之。未几去任，旋以太守需次云南，仍携志稿自随，既成书，寄其门人陆生渐鸿，属陈于官而刊行焉。忽忽十有余年，当事恒谬悠之，无肯为力者，越丁亥十月，余捧檄摄同知事，陆生复陈其书，请如前。余亟读之，瞿然曰“此固守土者之责也，余敢没余君之美而令九仞之山亏于一簣乎！”明年政有间，遂督州人士筹设局，集资付之手民。……此书既成，著农功则知土性种植之所宜；考兵事则知治乱得失之所在；辨疆域则知扼塞险夷之所重；采风俗则知厚薄奢俭之所由；而且验户口之登耗则思所以厚之；别钟夷之生熟则思所以绥之；观人文之盛衰与民性质强弱，则思所以兴起而教育之。自时厥后，良有司精思职业，庶几乎有所取资而州之人共勉于文物声名之盛，是则不佞与余君之本志也。^{①7}

余泽春在古州任上开始编纂《古州厅志》，书未成时调往云南，其携带书稿去云南赴任，在云南完成编纂，将书稿寄给古州的学生陆渐鸿，嘱其呈给官府刊行。但可惜后任的古州官员并不重视，一拖就是十余年。一个调离贵州的湖南人对整理贵州文化满腔热情，与当时在任的古州官员的漠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亦足见湖南籍人士对保存与弘扬贵州地方文化的贡献。

^{①6}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2）》，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页。

^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页。

^⑤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页。

^{①7}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80页。

余泽春，湖南龙阳(汉寿)人，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丁玲的外祖父，其侄孙有著名学者余嘉锡。一起编纂的余嵩庆是他侄儿，余嘉锡之父。而易佩绅、易顺鼎父子也同时参与编纂，一部《古州厅志》竟然有湖南的叔侄、父子同时参与编纂，这也是一件奇事。余泽春、余嵩庆、易佩绅、易顺鼎都是近代湖南著名人物。

再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其编纂者曹昌祺(湖南长沙人)，具有独特新颖的史学观，其序曰：

抑昌祺更有进焉：厅当云贵之襟喉，达川、广之声援。自元以来，凡用武者所必争之地。方今互市羁縻，时局一变，英人踞緬，法人踞越，恃其星纬輿地之学、舟车鎗礮之艺，时有狡焉，思逞之心，万一败盟，隐忧实大。是则道里之短长，关隘之险要，山洞之深邃，水道之舒折，亦抚制疆索者，所宜究心也。然则是书成，昌祺以是为守土之程，抑不仅昌祺一人守土之程也，惟顾后之来者，时加蒐辑，勿以废兴听之，则昌祺之所厚幸也。^{②8}

此方志编纂，除了一般方志所具有的宣扬忠孝节义、弘扬地方文化外，又更进一步，即站在国际视野，看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普安的特殊战略地位。普安毗邻云南，西方列强已经占据东南亚的缅甸、越南，与中国亦只有一墙之隔。曹昌祺此序作于光绪己丑年，即光绪十五年(1889)，而四年之前光绪十一年(1885)，中国已经在广西镇南关大败法国军队。西方列强从西南侵入中国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事实上，咸同时期，西方宗教势力早已渗入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的教案频繁发生。因此，曹昌祺编纂《普安直隶厅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治理边疆、保卫边疆、防止列强入侵提供重要参考。于此，可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强烈现实意义。

(二) 探寻与揭密贵州远古文化

方志编纂，往往需对地方文化考镜源流。贵州方志编纂亦不例外。例如，民国《贵州通志》说：

曹始能《贵州名胜志》云：“贵州所治，殷商之鬼方。”又云：“《宋朝纪要》以鬼方地林多贵竹，因以名州。”此宋人说也。元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记》亦谓：“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鬼方之境。”故嘉靖、康熙、乾隆诸《省志》皆云“贵州，殷为鬼方。”《清一统志》、《职方典》并同其说。^③

此将贵州溯源至殷商之“鬼方”，故民国《贵州通志》亦说：“黔在殷代，当为鬼方，故本志托始于殷。”^④“当为”二字，说明民国《贵州通志》编纂者对贵州文化发展上限认识的犹豫。之所以如此，关键还在于缺乏确凿证据。而邹汉勋通过编纂贵州方志，发现了解开贵州远古文化之密码，通过考证，揭示了贵州远古文化发展真貌。这就是邹汉勋关于红崖碑的研究。红崖碑是贵州关岭县的一座摩崖石刻，又称“红涯天书”。一块巨型崖壁上刻有二十多个似图似文的符号，引起了古今中外众多人士的研究兴趣，或以为是殷高宗伐鬼方之纪功碑，或以为诸葛亮武侯南征纪功碑，或以为建文帝讨伐朱棣檄书，或以为吴三桂藏宝图等等，当前仍然是世界一大文化奇迹和研究热点。

红崖碑图文第一次被载入史册是道光《永宁州志》，在卷首图录里收录“红崖山诸葛碑”^⑤，卷三“古迹”有简要说明：“诸葛碑，在红崖晒山悬崖上，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识。字若朱书，并非镌刻，岩石剥落寸许，笔画如新，兹将字形摹刻卷首。”^⑥《永宁州志》关于红崖碑的记载只是简单的客观描述，故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足够重视。邹汉勋于道光时期编纂《安顺府志》，敏锐地发现了红崖碑的重要史料价值，将红崖碑收入《安顺府志》卷十二《古迹志》中，且将《永宁州志》的“诸葛碑”改称“殷高宗石刻”，将红崖碑历史直溯至殷商时期。并附上《殷高宗石刻释文》^⑦。这是学界第一次对红崖碑进行系统的文字考释。“考其文义，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刻石。土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

^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4)》，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04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6)》，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28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6)》，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29页。

^⑤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0)》，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65页。

^⑥⑦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0)》，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83页。

碑，非也。”^③邹汉勋通过详实考证，认为贵州实际自殷商时即入中原版图，贵州文化起源甚早，红崖碑就是证据，这是殷高宗征讨贵州的纪功碑。后来之所以无人知晓，这是因为“士大夫咸鄙夷其地，无人搜讨及之”^④。因历史原因，人们以贵州为荒蛮之地，在文化上蔑视之，使得贵州文化的价值不被人们发现。邹汉勋由编纂贵州地方史志，发现了贵州地方文化中的闪光点，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使得藏在大山深处的珠玉得以进入人们视野。邹汉勋的考释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包括阮元、章太炎、刘心源、莫友芝、陈矩、任可澄等均受其影响。任可澄在编纂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一》中还详细列举了邹汉勋的红崖碑释文，以及各家在读邹汉勋考释后产生的新认识。显然，邹汉勋对贵州红崖碑的研究，使得红崖碑迅速享誉全国乃至海外，吸引了中外一大批爱好者来探秘和深入研究。邹汉勋的研究，不但弘扬了贵州文化，推动了贵州地域文化的研究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贵州文化自信，改变了人们对贵州文化的认识，并对探寻中华上古文明的历史真相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晚清入黔湘人对贵州开放兼容文化品格形成之影响

不同地域有其不同文化品格。文化品格是某区域的人们在传承与发展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文化品格是一个历史范畴，同一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其文化品格也不尽一致。晚清时期，贵州文化繁荣，跃居全国前列，也形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在晚清贵州文化品格的形成中，入黔的湘人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⑤各地有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有些风俗并非利于政教和统治，故历代封建政权极力倡导移风易俗之教化。贵州属少数民族较多地区，历史上的贵州常处在被征讨地位。在建省前“叛服无常”，明代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逐渐接纳中原文化。但土司文化的惯性思维以及相对闭塞的环境，使得这种由文化冲突而演变成的政治冲突在晚清咸同时期重演。湘军援黔，虽然暂时平息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但也同时引发了一些入黔湘人的思考。如：

宝田之抚降苗，责令其先行薙髻。尝言苗之叛服无常，非独其野性然也，风俗之不一，政教之不及，相激相荡，因而生心。雍正间，苗已大定矣，然雉髻者十之二、三，益以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汉民既目为异类，苗亦自居于别种，苗疆所以多故也。欲苗不为乱，必令言语嗜好同于编氓，而要自责令薙髻始。盖形貌既同，言语嗜欲，始可更化，数十百年之间，苗民大驯，混同教俗，无所疑阻，则叛盗息矣。^⑥

席宝田在平息咸同贵州社会动乱后引发深深思考，如何才能维持边疆长治久安呢？战争实乃不得已的非常规治边手段，必须强化日常的社会治理。这实际上是席宝田为明清封建统治者治理边省提出的对策。席宝田认为，“苗疆所以多故”，主要问题在于对苗民的化服不够。化服的首要之举在于“必令言语嗜好同于编氓，而要自责令薙髻始”，也就是说要让苗民的发饰、言语等与汉族相同，只有苗汉形貌相同，则言语嗜欲可化，则苗汉风俗趋同，则苗民驯化，自然“叛盗息矣”。与战争的残酷杀戮相较，“化服”无疑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柔性安抚之法。席宝田虽然宣扬的是教化归服思想，但其中不无可取之处。“苗汉同种”，实质上就是将贵州的少数民族列为与汉族同等地位，这是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绝对不能以“异类”“野性”目之，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一切政措才能继续推进。这是边疆治理的基本前提。而“令言语嗜好同于编氓”，实际上是加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因历史原因有差异，水平不一致，文明程度有高低，这是正常现象。只有不断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认识、交流，才会消除文化隔阂，防止文化冲突。席宝田虽然站在封建统治立场说话，但从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而言，其对策是有积极意义的。席宝田的对策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治边办法，但要实施这种办法，不但需要长期耐心与坚持，更需要各级官员的开明与善政。这点，在贺长龄、黎培敬等入黔湘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贺长龄治黔9年，将一生主要宦迹奉献于贵州。其推行的正是席宝田所说的“化服”方略。而黎培敬，治黔14年，将贵州从文教断裂的边缘拉了回来。晚清

¹⁰②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3—170页。

③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④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1)》，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⑤(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43页。

贵州湖南籍官员中，与贺长龄、胡林翼、黎培敬等政绩类似的很多。概括起来，晚清贵州湖南籍官员的为政举措主要表现在维系社会稳定、注重民生发展、加强民风建设、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等方面。这些，也正是席宝田所倡导的政治“化服”方式。

欲化服，则必须苗汉同等。欲苗汉文化交融，则必须首先改变观念，打破长期以来贵州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封闭状态。其次，必须输入先进的文化理念与实际的文化内容。据前文可知，这些都在入黔湘人的不懈努力中于晚清的贵州得到了逐步实现。而正因为有这些入黔官员的不懈努力，晚清贵州才形成了一些优秀的文化品格。其中，开放与兼容并蓄无疑是晚清贵州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贵州建省前少数民族文化的封闭性毋庸多说。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曾遭受本族政治势力强烈反对。其后裔安贵荣等曾欲反叛，在王阳明的反复劝诫下才作罢。但其后人奢崇明、安邦彦等还是于明天启年间发动叛乱，演变成了前后持续 17 年的“奢安之乱”，造成西南边省生灵涂炭，死伤百余万。这充分说明了明代贵州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治与文化之强烈排斥。但，这种文化观念，在清末的安氏后人中就已经不存在了。安家元《奢香夫人献龙场九驿》^①：

开辟功何伟，奢香驿路平。朝天曾奏对，贡道遂由庚。

柔远无烦力，绥戍不用兵。世官宣慰袭，顺德诰封荣。

张据《奢香驿》^②：

谁激诸罗变，贪边诟有功。君王自长策，女子亦英雄。

九驿邮初置，三巴路已通。夜郎今自小，不待问唐蒙。

安家元和张据皆为本土诗人，且安家元还是奢香夫人后裔，称奢香夫人为“英雄”，高度颂扬其通九驿之开辟奇功，显示了大一统思想在清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一致认可。这种认识的形成，与苗汉文化交融有关。例如，晚清毕节彝族余氏家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家族一直有文学创作传统，正是因为该家族对汉文化之广泛吸收，才诞生了许多著名诗人。如，余家驹，彝族奢氏后人，从小接受汉学教育，为贡生，其诗集《时园诗草》不但以汉文化诗歌体裁创作，而且其中汉文化内容丰富。仅看一些篇题，如《读史醉占》《读宋史》《宋玉言风有雌雄，戏作贫富二风》《昭君》《武乡侯》《宫词》《演桃花扇剧》等^③，便知其中汉文化影响之大。余家驹儿子余珍曾“欲以科名显”，其对汉文化之服膺是显然的，也有诗集《四余诗草》^{④⑪}，其《读桃花扇传奇》等篇章也表明了对汉文化的接受。余家驹侄儿余昭，从小跟随伯父读书，三赴科场，历官知县、知州、后补知府等，著《大山诗草》，其中对汉文化经、史、子、集征引广泛^①。余昭妻安履贞是彝族著名女诗人，著《圆灵阁集》，^⑫其中对汉文典籍同样征引较多。族人余达父，不但著诗集，且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担任贵州省立法议员。这些充分显示了开放性与兼容并蓄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晚清时期，一波又一波的湘人入黔，实质就是湘黔文化一次又一次的深层交融。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贺长龄在贵州执政 9 年，用他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经世致用。晚清时期的贵州实际上成为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大实践基地。湘人入黔推动了晚清贵州文化的巨大发展。

^{⑪①}李芳：《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1985 年，第 562 页。

^{⑫②}李芳：《大定县志》，贵州省大方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1985 年，第 575 页。

^{⑬③}（清）余家驹著，余宏模编注：《时园诗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

^{⑭④}（清）余珍著，余宏模编注：《四余诗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

^{⑮①}（清）余昭，安履贞著：《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年。

^{⑯②}（清）余昭，安履贞著：《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年。